

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国内研究述评

张茂一 王洪树

摘要：中国政党制度既是我国政党民主关系的制度规范，也是我国现代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学界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呈现蔚然燎原之势。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马列经典、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哲学等角度梳理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二是从政治学、历史学等视角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生成动因及历史发展脉络；三是从党内关系、党际关系、党国关系、党与社会关系、党与世界关系出发，进行现实建构；四是从理论、法治、文化、道路等维度探讨未来发展。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继续探讨的广阔空间。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政党理论；政党建设；政治发展

中国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19)02-0030-09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转的重要制度支撑。基于政党制度对当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近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术界都努力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中，在国内视野与国际视野的比照中，梳理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过去、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国政党发展的内在规律，描绘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前景，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探路。

一、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

中国政党制度究竟是建立在何种理论基础之上，学者们基本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影响达成了共识。部分学者也尝试从更深

层次的政治哲学角度解读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因此，当前学界在探讨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时呈现出三条线索，即马列经典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溯源、政治哲学溯源。

(一) 经典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民主政党理论及发展

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由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党经典理论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应的创新理论形态所组成。以林萍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在阐释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基础时对两种理论形态作了清晰的界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多党合作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为中国政党制度提供了理论

来源；而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构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政治理论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①很明显，这里的“理论来源”与“理论根据”具有内涵上的区别。正因为这种区别，学者们在探讨理论基础时呈现了差异化视角。学者们不仅从传统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民主政党理论作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而且也不断关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成果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确立与运行的重要性。以林尚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以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重要依据。^②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和民主监督理论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三块理论基石。还有学者对理论基础的内在逻辑层次做了系统性梳理，确定了“本质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层次（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实践层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③分析框架。这里的实践层次，是指前两个层次与中国化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创新理论形态。以上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民主政党理论从“源头”（或渊源）意义上构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民主政党理论的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从“支流”（或直接）意义上构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

（二）文化溯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传入中国，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很多学者认为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和合”内涵及自觉性、包容性特点密不可分。他们的代表观点主要体现出两种思路：一是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和合”内涵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及意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和”、守“中”、依“势”的价值理念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徐晓媛，2009）。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在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渗透是“中国特色”的显性标

志，从而使多党合作关系根本区别于西方的竞争性政党关系，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在“丛林法则”下的生存逻辑。二是基于中华文化的自觉适应性特点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自我更新能力，这是中国政党关系能够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陈钰业，2015）。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这种自我更新的重要成果。因此，有学者还看到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革命实践而产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中国政党制度产生的重要性，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科学”、“大众与民主”的突出特点视作我国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决定因素。^④这一动态的文化发展视角为我们挖掘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政党制度运行发展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讨论空间。

（三）哲学溯源：本体论、公平观及人性论

为数不多的学者也尝试从政治哲学视角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解读。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哲学基础就在于以政党政治创制为逻辑前提、以人民利益的道义代表为本体论、以领导与分工为方法论，三个相互关联；^⑤在梳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西方政治哲学中公平观的基础上，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是以追求公平为己任、以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价值的；^⑥从抽象的人性层面出发，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政治性格的表征或结果，具有深厚的人性层面的正当性。^⑦基于道义本体论、公平观、人性论的政治哲学分析无疑是一个深邃的考察视角，为研究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新的思考范式。中国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并体现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适应，这就要求在对中国政党制度进行哲学分析时应该深刻关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自洽性”。中国传统

① 林萍：《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基础》，《统一战线理论》2008年第4期。

② 肖存良、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③ 朱广亮：《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一种系统论的解读》，《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④ 程云庆、刘诚：《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文化向度探析——基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视角》，《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⑤ 孙津、张丽：《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

⑥ 李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在公平观的视野中》，《天津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⑦ 姚选民：《试论新中国政党制度的正当性——一种政治哲学基础探求》，《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文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哲学命题，这深刻揭示了世界在多样性的统一中实现自身发展的演进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中国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在历史与现实形成的既民主监督，又亲密合作、荣辱与共的关系与两种哲学具有的“自洽性”是紧密联系的。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国政党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政党制度究竟在这一过程中是怎样生成和发展的，又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特征，这是解析该制度的历史逻辑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就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学术界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考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梳理史料文献尝试厘清历史脉络，并运用政治学理论，探究其中的生成与发展动因。

（一）历史生成：中国政党制度的后发引进与内生创造

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双向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发展走向。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严密控制，社会发展缺乏一定的自主发展空间，社会利益诉求被严重边缘化甚至忽略，中华传统帝国最终走向解体。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存过程中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发展经验，西方政党制度被逐渐引入进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尝试多党竞争制度失败后，经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承担引领社会转型与国家成长的任务，由于其悬浮于社会之上，脱离社会底层，1928年开始推行“一党训政”，独断专行，破坏与共产党的两党合作关系，这表明国民党难以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最后，产生于体制外的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是一个面向社会的政治动员性政党，通过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探索，众望所归地承担了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任务，最终实现了“社会—政党—国家”的一体化建设。因此，以林尚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双向需求的内生结果（林尚立，2009）。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双重逻辑使中国特

色政党制度是一种与之相适宜的内生型政党制度。现代国家的成长需要一个核心的政党通过有效的政治联合方式整合社会的分散力量，政治协商也必然内生于这种方式之中。由此，中国政党制度的三个基本要素（政治领导、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得以历史性的渐次形成。

各党派力量博弈与理性设计。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视角，从宏观结构方面揭示了中国政党制度产生的原因，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各政治力量单元之间的互动影响。学者们逐渐引入西方“博弈论”“制度主义”等理论，从多元政治力量互动博弈与制度均衡的角度阐释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成为一种新的尝试。一切政治行为背后的动机根源是利益。有学者认为各党派基于集体利益最大化目标而产生的合作博弈关系，通过帕累托改进达到制度最优状态。^①这里的共同利益在革命时期体现为实现民主共和，在建设时期是以繁荣社会主义事业为目标。共同利益是多党合作的坚实基础，使多党合作成为可能，而不同党派的利益差异性使多党合作又成为必要。博弈不是一个客观自发的过程，而是自觉的理性选择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与共同利益的调适下，各党派通过理性的合作博弈共同设计了新型政党制度。这正如周淑真所指出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凭借政治智慧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做成”的。^②从以上学者的观点来看，博弈论视角不仅坚持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而且找到了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变迁的主体。

政治参与和政党制度化的形成。社会结构的变动使社会日益趋向多元化利益格局。各个党派都力图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与实现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及阶层利益。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对这种基于利益的公共诉求给以回应。这种回应最终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形态的形成。无论是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还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互动，最后都是以政治参与制度化和程序化而成为民主推进的动力。基于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有学者就从“政治参与”

① 刘宁宁：《合作博弈视角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② 周淑真：《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体现》，《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5期。

和“政治制度化”两个维度考察了帝制瓦解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嬗变过程,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党制度为何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罗浩轩,2018)。一方面,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与否关键看各社会力量政治参与扩大的程度。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党专政”限制了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及利益表达,但是群众政治参与势头已经不可逆转,于是整合政治力量、引导有序参与和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另一方面,政治参与扩大化的程度必须与政治制度化的水平相适应,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而建立的中国政党制度适时而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政党制度在扩大政治参与、协调不同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实现多元力量整合方面确实取得了较好的制度效能。

可见,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缘起主要集中在民主现代化理论、博弈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层面的学术解读上。寻找历史缘起的理论支撑,尽管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但是却缺乏在一种基于“大历史观”视野下的贯通性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属于世界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双重范畴,因此在研究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缘起时应该以更大的时空视野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做到两者具体的统一。

(二) 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政党制度的分期性问题

历史分期是否科学取决于分期的依据是否合理,尤其是对研究对象的“形成”与“确立”等重大历史节点认识是否合理。目前学界在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分期问题上主要有四种代表观点。一是五阶段说。钟德涛提出了“初级雏形——正式形成——正式确立——探索性建设——制度性建设”五个阶段。^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使中国政党制度初具雏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央政府的组建是中国政党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正式确立阶段;“三大改造”完成到十三大属于探索性建设时期;十三

大闭幕至今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时期。他运用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大量详尽的史料对中国政党制度形成与发展进行审视,无疑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二是四阶段说。这一说法在学界比较普遍,但学者们在具体认识上也有差异。有学者从“孕育——形成——曲折——新阶段”四个阶段对中国政党制度进行历史考察,认为它孕育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然后经历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夏燕月,2009);也有学者提出了初步发展(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严重波折(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恢复发展(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期)、全面升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时期)四个时期(周维启,2011);还有学者提出了萌芽(新民主主义革命)——磨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淬炼(改革开放)——开拓(新时代)四个阶段(张师平,2018)。三是三阶段说。张钦朋把中国政党制度分为“确立——曲折发展——不断完善”三个阶段。^②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为形成确立阶段;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为不断完善阶段。四是两阶段说。有的学者以“文化大革命”为界标将中国政党制度划分为两个阶段(张惠康,2010)。第一阶段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为标志初步确立,随后经历了7年的基本形成历程,在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历经曲折;第二阶段经历了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制度恢复、第三代领导核心政党制度化建设阶段,再到第四代领导核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尝试对中国政党制度进行历史分期,但是大多没有作深刻的分期依据考察。因为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分歧较大。

“一般认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③然而

① 钟德涛:《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8页。

② 张钦朋:《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基本特点及其经验启示》,《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③ 蒋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兼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两项制度说》,《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年第1期。

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得到确认。又如“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①可见,就新政协的成立到底是形成的标志性事件还是确立的标志性事件是有很大争议的。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分期还有待结合更多史料,置于历史中去思考事件的重要影响,以做出更清晰的历史厘定。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现实建构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国政党制度运行面临多重挑战。在西方民主化浪潮下,西方的政党话语正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在社会阶层分化大背景下,新兴阶层展现出日益强烈的政党政治参与感;个别党员干部的腐败堕落也使制度认同式微。但也应看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十八大之后正着力构建的“新型政党关系”更进一步加快了政治文明进程,从而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完善提供了空前发展机遇。面对挑战与机遇,近年学者们分别从政党内部建设、党际关系、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政党与世界等不同角度展开了中国政党制度现实建构的讨论与分析。

(一) 各党派的内部:提高执政能力与参政水平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复杂多变,面临多重考验与危险,执政党建设一直是重点话题领域,而且成果丰富,呈现出体系化、专业化甚至学科化(如党史党建及中共学的兴起)特点。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关键在于抓好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共识(顾海良,2014;王长江,2017;牛秋业,2018等)。代表性观点主要集中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从理论角度看,主要是围绕执政规律、执政党历史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阐述执政党建设研究的逻辑理路;^②从实践维度看,主要是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建设、“学习”“服务”“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等多个方面提出具体路径。^③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对党的建设做了结构性调整,将政治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关于政治建设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这些成果纷纷“围绕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以及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基石、思想传统、现实土壤、科学内涵、体系架构、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等开展研究”。^④

虽然参政党建设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但是,随着新时代执政党一系列有关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政治参与的制度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建设意见的出台,尤其是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及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这表明参政党建设及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学界围绕参政党建设的内涵认识、理论建构、实践路径等方面做了大量探讨。在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内涵上,王洪树和虞崇胜认为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就是“以保障参政党成员当家作主为政治目标,多维多层地开展制度创新和活动创新,使政党成员平等参与政党事务管理活动,发展充满政治活力且健康有序的政党民主的政治过程”。^⑤在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上,黄天柱认为在理论上应对参政党代表性、政党趋同性、办党开放性、建党规范性等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⑥在实践上应该保持相对独立性,立足参政党角色的重要性。^⑦总体来看,学者们在参政党建设研究体现了重理论轻实践的特点。虽然早在2010年《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格局中的参政能力建设》一书在对浙江省参政党能力的实证考察基础上,从加强自身建设能力、影响国家能力、影响社会能力、构建参政党能力建设成效评估体系等角度,系统探讨了参政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张惠康,2010),但是近年像这

① 余科杰:《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史考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1期。

② 王长江:《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③ 顾海良、丁俊萍:《当代中国执政党建设之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④ 熊秋良:《十九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述评》,《理论视野》2018年第12期。

⑤ 王洪树、虞崇胜:《新时期中国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内涵探索》,《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⑥ 黄天柱:《新时代参政党建设的整体态势与路径选择》,《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5期。

⑦ 黄天柱:《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0期。

样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证为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二) 执政党与参政党：在非均衡结构中加强合作协商

中国共产党与各大民主党派的党际关系问题及结构关系特征一直被学界所关注。这种关系是一种多维要素的集中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是一元化的核心要素，八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是多元化的基本要素（王小鸿，2009）。很显然，这种党际关系结构具有不对称性特点，因此，有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政党制度是一种非对称性政党制度（虞崇胜，2009）。这种不对称性制度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功能和彼此关系上。它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又充分地吸纳了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政治参与。正是有了这种非对称的结构特点，才“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①

如何处理党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更好发挥政治功能，必须着眼于党际协商的发展与完善。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的各党派协商及协商的方式做了规定与说明，这意味着中国式的党际协商关系正式诞生。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又将政党协商置于七种协商形式之首，这使政党之间的协商成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内容与政党制度发展的关键。党际协商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方向，围绕当前党际协商制度困境、能力不足、程序不规范等难点问题呈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主体角度认为应提升协商意识与协商能力，加强主体间的协调配合与良性互动（齐春雷，2018）；二是从机制角度认为

应规范协商程序，强化协商反馈机制建设（宋雄伟，2018）；三是从原则角度认为应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本、求同存异、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则（任映红，2017）；四是从法制角度认为应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纳入重点立法的领域（宋俭，2017）。由于特定的政党关系结构，政党互动合作成效的关键还在于执政党主导作用的发挥。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善领导方式以提高合作能力，完善政党制度为合作协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 政党与国家：全面从严治党与适应性调整

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上面，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政党制度基于国家建设需要产生，又推动国家建设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党制度形成之后逐渐嵌入到了国家制度之中，与其他制度一起建构了国家的政治体系（林尚立，2009）。以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为标志，中国政党制度进一步嵌入到立法、司法体、行政等体系之中，促进了国家的多元整合。该意见也凸显了政党制度本身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自觉状态正在形成。因此，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为中国政党制度推动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也体现为现代国家的成长进一步促进了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在深入推进，这就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肖贵清等认为应该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两个层次（能力与体系）发挥政党作用。^②一是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提升执政能力，实现对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领导，优化国家治理合力；二是通过推进党内法规建设与完善党内治理体系，引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政党治理面临的挑战出发，张学娟认为在国家治理的整体推进中执政党要加强适应性调适。^③当前的多元主体治理、动态开放治理和智能信息化治理转型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执政党威信。由此，中国

① 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② 肖贵清、田桥：《政党治理引领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逻辑理路》，《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③ 张学娟：《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中共执政资源的优化：理念与策略》，《湖湘论坛》2017年第3期。

共产党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协调执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基础上,优化与调适各种执政资源。在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构建上,学者们赋予了执政党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而对参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探讨较少;比较注重执政党引领国家治理,而对人民民主的原则性立场关注不够。人民民主的原则性立场一定要体现人民意志整合,参政党在这种整合中拥有自己的独特作用,这就需要参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各种活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

(四) 政党与社会: 加强政党表达与实现利益整合

中国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关系紧密,中国政党制度面向社会表现出了强大的整合优势与社会凝聚力,这种优势恰好是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所不具备的。虞崇胜从非对称结构出发对这种优势做了深刻的解读,他认为这种结构能够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统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虞崇胜,2009),从而有利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党制度在社会利益整合与社会力量凝聚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强化的领导功能可能导致对公意的忽视或歪曲,“教化”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表达”(许忠明,2009)。因此,面对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多元,学者们主张应该把表达功能与领导功能的调适作为协调中国政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中国政党制度需要意识形态扩容(刘惠,2010);另一方面中国政党制度要增强利益整合的包容心与渗透力(耿百峰,2010)。现代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和多元化特点根源于日益原子化的社会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需要体系,而个体需要的满足都是以独立于自我之外的他者为中介来实现的。^①政党正是这种实现个体利益的他者中介。各党派的利益表达与实现功能能否实现,既决定了国家与社会的撕裂程度与弥合程度,更决定了各自代表的阶级及阶层的利

益实现程度。

(五) 中国政党与世界: 中国方案与开放借鉴

中国政党制度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理应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理论品质。学者们从开放性角度探讨中国政党与世界的关系时主要集中在“走出去”与“引进来”两个层面。一方面,中国政党制度提供的创造性方案使其有底气“走出去”影响世界。郭道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对世界的创造性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新的政党政治组织模式,也在于开创了新型政党监督机制。^②中国政党制度的创造性方案所释放的优越性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反思。中国政党制度要被世界真正接受与认可,还需要加强对外交流,发挥宣传媒介的作用,充分展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渊源、政治特质、功能优势,揭示独特性中蕴含着一般性,以此逐渐纠正西方政党制度就是现代民主的代名词的认知偏见。2017年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政治尝试。另一方面,立足全球视野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引进来”进行吸收与借鉴。周淑真认为不仅要“借鉴国外成功的政党关系机制,发挥多党在合作中相互监督和鞭策的作用”;还要“借鉴国外政党应对国家政治环境变化以确定自身定位的成功做法”。^③我国当前政治发展如何应对世界民主化浪潮?有学者认为应该在借鉴西方及亚洲政党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政治沟通机制、竞争机制等有益经验的同时,还要追踪国外最新的民主理论动态(常欣欣,2008)。当然,借鉴并不是照搬照抄,一定是汲取他国制度的合理要素,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进行本土性转换,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四、中国政党制度的未来发展

中国政党制度可谓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必然且伟大的政治创造。其制度特长与政治优势的进一步发挥,有赖于上述各种政治关系在制度层面的深度构建以及政党制度发展空间的更大拓展。这将有助于彰显我国政党制度旺盛的生命力。就我国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页。

^② 郭道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的理论分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周淑真:《借鉴世界政党制度文明 创新中国政党制度》,《江汉论坛》2008年第8期。

政党制度未来发展而言,学者们从理论、制度、文化、道路四个维度勾勒了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方向。

(一) 总结多党合作规律, 创建话语体系, 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创新理论

中国政党制度理论构建的目的在于形成“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逻辑结构体系。学者们围绕该体系构建的重难点、主要内容、话语特色及建构方法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在重难点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构建的难点在于参政党理论建设;重点在于党际监督的理论界定和实践操作的权威性、制度化和实效性(聂阿山,2010)。在主要内容规划方面,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即: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论,人民民主与多党合作论,制度要素与政治协商论,民主价值与政治功能论,制度建设与发展路径论,执政党与参政党建设论(任世红,2009)。在话语构建方面,近年学者们基于西方政党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将“术语革命”与“理论创新”作为中国特色政党理论构建进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中国政党话语构建“就要用中国先进的政党制度理论和话语表述充实世界政党制度话语体系”,^①而话语主体能力、话语体系内容、话语体系机制是话语建设的三个重要维度(杨松绿,2018)。虽然已有的学术成果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构筑已经表现出立体化的认知特征,但是鲜有学者系统关注中国政党制度构建的方法论原则。我们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构建的重难点、内容确立、话语表达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坚持辩证分析法,坚持历史与逻辑、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二) 顺应时代发展, 遵循政党法治规律, 循序渐进地推进政党制度法治化进程

随着阶层的日益分化与利益交织的复杂化,不同利益阶层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或中介来寻求公共保护。如何保障多元利益公共表达的畅通与有序,对政党制度的法治化水平提出了时代性要求。

学者们就法治化的具体路径给出了设计思路:一是要以党内法规为基础的法治化。殷啸虎认为把党内法规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法治化的规范样本,应当是我国当前政党立法的可行性选择路径。^②从这种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已经为政党制度的法治化进程提供了榜样示范。二是尊重规律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秦前红认为应该参照他域经验,遵循政党法治化的一般规律,按照中国政党法治的特有逻辑构成,循序渐进进行系统化设计。^③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实施,学者们尽管就政党法治化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但是难以定位中国政党制度法治化的标识性文本是目前中央颁布的系列《意见》《准则》《条例》等政策性文件,亦或是应该专门颁布一部《政党法》。这已经形成一个持续争论的公共话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 整合社会政治文化, 塑造制度文化生态, 促使形成各党派政治和谐的良好氛围

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其发展进程的重要软性力量。中国政党制度的未来发展,必须重视当前各种政治文化生态,深度开发中国政党制度的文化资源,积极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政治思潮多元并存,蔡冬菁认为“整合社会政治文化,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是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④有学者认为这种整合路径一方面在于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入手,构筑起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另一方面需要培育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转变传统政治观念(孙景峰,2011)。简言之,这两条路径分别是意识形态路径与现代民主文化培育路径。对于前者,应该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凝聚作用,大力弘扬传统和合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引

① 虞崇胜:《亟待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② 殷笑虎:《新型政党制度法治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③ 秦前红、苏绍龙:《中国政党法治的逻辑建构与现实困境》,《人民论坛》2015年第7期。

④ 蔡冬菁:《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广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导公众理解、认同中国政党制度背后蕴藏的精神实质；而对于后者，必须进行深刻的文化革命以根除传统封闭保守的政治心理基础，培育现代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四）毫不动摇地坚持与发展我国政党制度，在制度功能中展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优势。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主政治发展的前途与命运。基于对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很多学者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政党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特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资源禀赋。王洪树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特质充分表现在历史维度上的内生性、创造性、调适性和可持续性，内在要素的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制度与环境互动方面的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这些政治特质将有助于中国建构具有良善导向的高质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①二是中国政党制度所释放的民主绩效已经证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实现我国高效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②正因如此，林尚立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对中国民主政治道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林尚立，2009）。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③的任务，这为完善中国政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指明了政治方向和路径。当前中国政党制度已经具备一定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但该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还需进一步制度安排与设计。

五、结语

国内近十年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成果丰富，在理论基础、历史缘起、现实构建、未来发展等几个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讨论。但是总的来看也有一些

不足。从研究文本看，当前学术论文较多，而有影响力的专著相对较少，研究比较零散。从研究内容上看，对执政党制度建设探讨较多，对民主党派的制度建设探讨相对较少；研究大多以史料梳理或文件政策解读为主，理论观点创新不足；即使一些研究尝试用新的理论话语进行阐释，如博弈论、新制度主义等，但也存在这些理论话语的适应性与解释力受限问题。此外，虽然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学者们都有所涉及，如历史分期、法治化问题，但观点模糊，争论分歧依然很大。从研究方法看，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规范研究方法是主流方法。但是研究方法总体较为单一，多学科融合不足，对本土或国外的实证研究也较少。从研究话语来看，在政策文件话语主导下，学界自身话语严重滞后，匮乏“非对称结构”等特色概念的提出和深度阐释。因此，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要进一步走向深入，还需要进一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方法，不断加强研究的系统性，直面中国政党制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学科交叉审视，创新政治话语体系，尽快构建既有中国特色与风格，又有世界视野与文明意涵的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方能筑牢中国政党政治走向未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 林尚立. 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9, (9).
- [2] 虞崇胜. 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内在机理分析 [J]. 理论探讨, 2009, (6).

作者：张茂一，乐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王洪树，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毛军吉

① 王洪树：《对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多视角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4期。

② 刘严、黄景睿：《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28页。